

中華書局

敦煌

遺

書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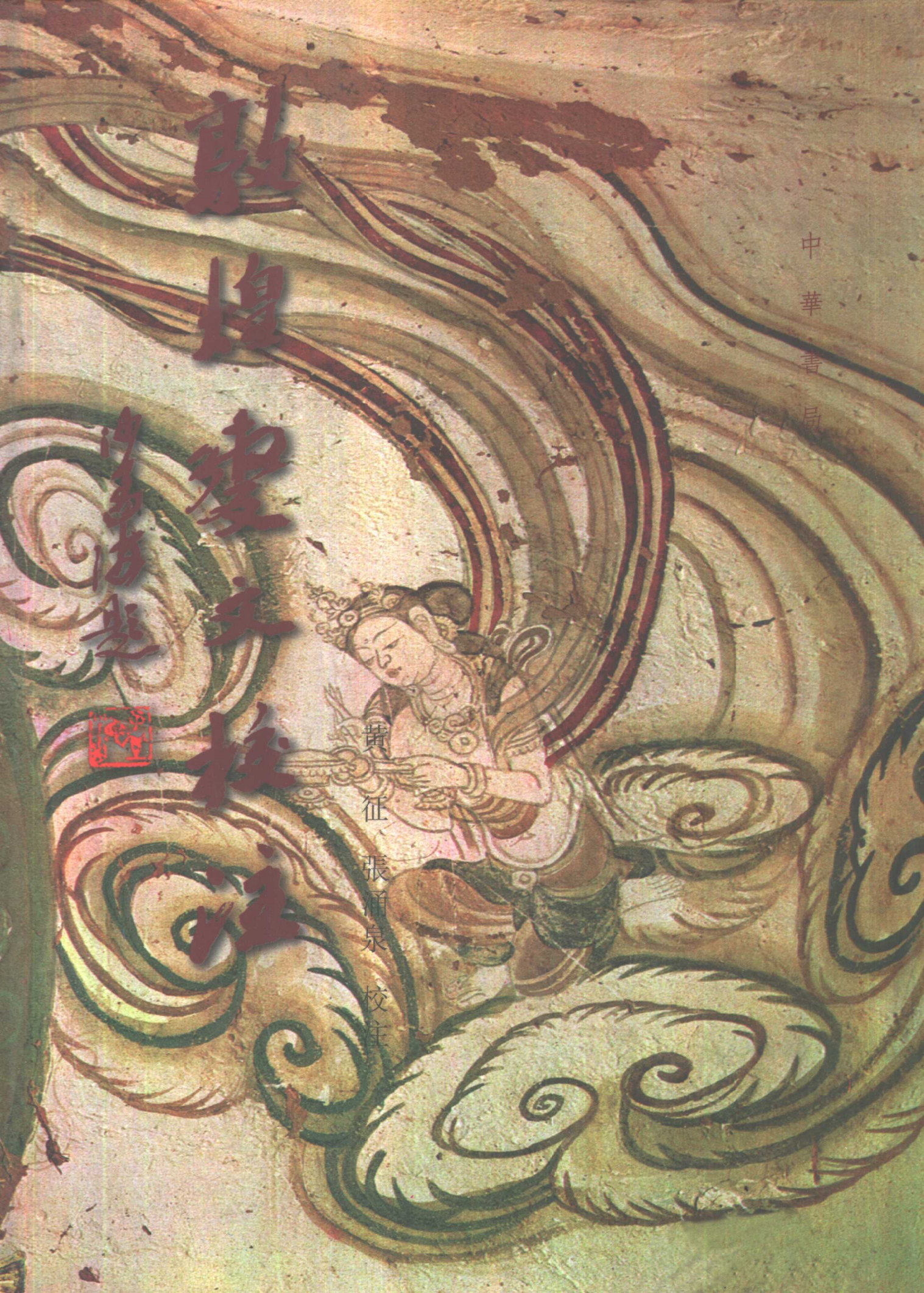
注

卷

張涌泉



黃征、張涌泉校注



K870.6

敦煌變文校注

黃征
張涌泉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變文校注/黃征,張涌泉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7

ISBN 7-101-01209-4/H·104

I. 敦…

II. ①黃…②張…

III. 敦煌—變文—校勘

IV. K870.6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83½印張·1443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定價:160元

序

國人知有敦煌俗文學，蓋始於王國維先生一九二〇年刊布之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嗣後，陳寅恪、向達、鄭振鐸、王重民等先生咸有撰述；論者既夥，而所分亦漸細矣。變文為敦煌俗文學作品中份量最重、影響最鉅者。其為宋元話本之先導，治小說史者不可不特予關注；其為六朝唐宋俗語詞之淵藪，治漢語史者不可不致心研究；而其為歷史、宗教、民俗諸學寶貴文獻，則諸學科之研治者復不得不隨時留意。至於變文之體，蓋為說唱之類，為舊傳而非有唐新創。或謂變文之體舶自印度，余不信之，蓋漢代大賦中已有此體也。

變文作品之校錄，殆肇始於羅振玉先生之敦煌零拾，其所謂「佛曲三種」，實即變文之一體。稍後劉復輯敦煌掇瑣、向達輯敦煌叢鈔、許國霖輯敦煌雜錄亦各有校錄。一九五四年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彙錄，始彙為專書。一九五七年，向達、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編敦煌變文集，則集其大成。然敦煌變文源於民間，記以口語，字多俗別，校錄殊非易事。故各家所錄，時有出入，讀者不能無疑焉。一九五九年，蔣雲從先生作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辨字釋詞，創獲極多，每有讀者冥思苦索而不得其解者，得以渙然冰釋。此後三十多年間，有關研究論文日見其多，或質疑問難，或辨正商榷，於變文文義之理解，咸有助益。然其文散諸報刊，尋檢未便，讀者苦之。近年臺灣學者有變文新校本之作，然於近數十年變文校理之新成果尚未及採擷，讀者猶有憾焉。

友生郭君在貽，年來與張涌泉、黃征二君合作進行「敦煌學三書」之科研項目，敦煌變文校注即其一也。詎料書未及撰，郭君遽然棄世而去，昊天不淑，痛何可言！所幸涌泉、黃征二位，克承遺志，稟持師訓，黽勉數載，而成校注之作。余觀其書，蓋以敦煌變文集為基礎，而增補其未備者，重覈之於變文寫本原卷（縮微膠卷），匡糾原編之失者；且薈萃各家新校新說，復出己意加以按斷；注釋部分，重在俗字、俗語詞之詮解，以俗治俗，勝義紛綸；其為敦煌變文校理之集成之作，蓋非過譽也。



前言

公元一九二〇年四月，著名學者王國維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的著名論文。在王氏所稱之「通俗詩」、「通俗小說」中，有所謂「季布歌」、「孝子董永傳」、「目連救母」、「李陵降虜」及「唐太宗入冥小說」、「伍員入吳小說」等多種。人們後來纔知道，這些所謂的「通俗詩」、「通俗小說」，多數乃是我國失傳已久的「變文」。王氏的上述論文，也就正式揭開了敦煌變文研究的序幕。

但由於當時大多數敦煌寫本材料都沒有公佈，人們對變文的認識尚處在初級階段，所以對變文這種失傳已久的文體便難免存在種種的隔閡。一九二四年，羅振玉輯印敦煌零拾，其中有「佛曲」三種（即後來收入敦煌變文集的降魔變文等三種），這是國內外最早刊佈的變文作品。但因這三種敦煌寫本都首尾殘闕，羅氏找不到原名，只好姑且名之曰「佛曲」。羅氏在跋中說：

佛曲三種，皆中唐以後寫本。其第二種演維摩詰經，其他二種不知何經。考古杭夢遊錄載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武林舊事載諸技藝亦有說經。今觀此殘卷，是此風肇於唐而盛於宋兩京，元明以後始不復見矣。

羅氏把「佛曲」作為宋代「說話」之先驅，可見他所指的「佛曲」，乃是「說話」一類的通俗文學，這正是羅氏的高明之處。但後來的人們誤會了他的原意，乃把它和唐代流行的作為一種樂曲的宗教佛曲混為一談。直到一九二九年，向達發表論唐代佛曲的論文，纔對這種誤用予以糾正。除了「佛曲」以外，當時還曾出現過「曲」、「演義」、「俗文」、「唱文」等等的稱呼。但隨着變文作品的不斷發現，有關的研究論文日見其多，人們對變文的認識也開始明確起來。一九三一年三月，小說月報刊佈鄭振鐸的論文敦煌的俗文學，首先採用了「變文」這一名稱，後來鄭氏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又用相當多的篇幅對「變文」加以闡述。在鄭氏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大力倡導下，「變文」之名便逐漸流延開來，並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是，「變文」是如何得名的？變文這種文學形式的淵源是怎樣的？却是一個長期以來困擾着學術界的難題，

至今似乎仍未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七十年來，許多前輩學者為此進行了艱苦的探索，諸如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向達的唐代俗講考、傅芸子的俗講新考、關德棟的略說「變」字的來源、周一良的讀唐代俗講考、孫楷第的讀變文雜識、王重民的敦煌變文研究、王慶菽的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程毅中的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周紹良的談唐代民間文學，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作。現在學術界比較傾向地認為：「變文」和另一種叫做「變相」的圖畫有關，「變文」之「變」即「變相」之「變」，大約是變化、變現、變異之義，「變相」是類似於連環畫的故事畫，「變文」本是「變相」的文字說明，後來「變文」脫離「變相」而獨立，便演變成爲一種通俗文學體裁。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六章「變文」節下云：

像「變相」一樣，所謂「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爲「俗講」之意。（變相，是變「佛經」爲圖相之意）。

傅芸子俗講新考云：

變文本是相輔變相圖的，所以謂「變」者，即是佛的「說法神變」之義，變文和變相圖的含義是同一的，不過表現的方法不同，一個是文辭的，一個是繪圖的。以繪圖爲空間的表現的是變相圖，以口語式文辭爲時間展開的是變文。

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云：

變文者，「變相」之文也。……經變原是有故事的畫，後來爲通俗起見，又拋去原來所據經典，再以當時文體重述畫裏的故事，於是就成了變文。……大約變文起源於「變相」之文，後來慢慢喧賓奪主，於是文漸漸獨立，而文所依附的變，反而消失了。

像這樣一些議論，雖不無可商之處，但總的來說是正確的。

關於變文這種文學形式的淵源，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

一、源自清商舊樂。如向達唐代俗講考云：「欲溯變文之淵源，私意以爲當於南朝清商舊樂中求之。……南朝清商樂中，本有變名之一種，其組織亦相當繁複，所謂前後送聲，或即後世之楔子與尾聲，而明君之屬，多至數百言，三百

弄，則其規模之宏偉，亦似非普通樂歌所能仿佛者也。唐代變文宜亦可以被諸弦管，……而其祖禰，或者即出於清商舊樂中變歌之一類也。」

二、源自佛典翻譯。如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云：「變文」的來源，絕對不能在本土的文籍裏來找到。我們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韻文散文合組的文體。最著名的馬鳴的本生鬘論也曾照原樣的介紹到中國來過。一部分的受印度佛教的陶冶的僧侶，大約曾經竭力的在講經的時候，模擬過這種新的文體，以吸引聽衆的注意。……從唐以後，中國的新興的許多文體，便永遠的烙印上了這種韻文散文合組的格局。講唱「變文」的僧侶們，在傳播這種新的文體結構上，是最有功績的。」

三、源自中國固有的賦體、叙事歌謠，而又吸收了佛教文學的影響。如王慶菽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一文云：「因為中國文體原來已有鋪采攤文體物叙事的漢賦，也有樂府民歌的叙事詩，用散文和韻文來叙事都具有很穩固的基礎。而且詩歌和音樂在中國文學傳統上就不怎樣分開的。因此，遇到那些用散文說經中故事，用韻文來梵唄歌贊的體制，很快就為那些俗講僧人和民間藝人把二者結合起來，於是產生「變文」。所以我認為「變文」是當時民間採取俗講的方法來說歷史傳說和故事的一種話本；而俗講也可能採用當時民間形式的歌曲和說話方式，以求引人入勝的。」

以上三說，清商舊樂說「除去樂府裏有變歌以及若干以變為名的曲子以外，似乎中間找不出什麼連鎖來」；佛典翻譯說又忽略了文學發展的內在因素，所以均未被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相對來說，第三說考慮到了變文產生發展的內外因素，顯得較合情理。後來馮宇、程毅中、張鴻勳等撰文，大體都沿用了這一說法，而又有所變化或拓展。

變文寫本是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裏被陸續發現的，其中大部分已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盜劫國外。由於種種的原因，這些寫本本身大多數並沒有標題；一些原有標題的卷子題名又有着變文、變、因緣、緣起、講經文、賦、話、詩、詞文、傳等等的差別；即使僅有的八、九種原來以「變文」或「變」題名的作品，也往往前題後題不一，甲卷乙卷有異；這種紛繁的情況，就給變文的鑒定帶來了困難，變文的辨體也就成了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另一個話題。早期的研究者一般地傾向於用「變文」作為敦煌所出講唱文學作品的統稱，如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傅芸子的俗講新考、關德棟的談「變文」，都把「變文」區分為講佛教故事和非佛教故事兩大類，其下統轄了講經文、緣起、

傳等等一些類目。後來周紹良編敦煌變文集^{二四}、王重民、王慶菽等編敦煌變文集^{二五}，更是兼收並蓄，把當時所能見到的說唱類作品一並納入其中。王重民後來曾有過一個說明，他在北京大學作的報告敦煌變文研究中說：

敦煌變文集根據變文的形式和內容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講唱佛經和佛家故事的，一類是講唱我國歷史故事的。第一類又可分成三種：一是按照佛經的經文，先作通俗的講解，再用唱詞重複地解釋一遍；二是講釋迦牟尼太子出家成佛的故事；三是講佛弟子和佛教的故事。後兩種都是有說有唱。第二類也可分為三種，但不以故事內容分，而是按體裁分的。第一種有說有唱，第二種有說無唱，第三種是對話體。這一分類和分類的排列次序，也正恰好反映了變文的發生、發展和轉變為話本的全部過程。……講經文是變文中最初的形式，它的產生時期在變文中為最早。……由講經文演化成為講佛故事和講歷史故事的變文，終於由變文轉變成為話本。在不同的階段之內，曾採用過各種不同的名稱；在不同的題材之內，又帶來了一些舊有的名稱。但在變文的全盛時期，則都用變文來概括這一類的文學作品，而作為當時的公名來使用。這就是在今天我們大家為什麼又認為只有用「變文」這一名詞來代表敦煌所出這一類文學作品，為比較適宜、比較正確的主要原因。

王重民先生在他的報告中還有詳細的闡述，限於篇幅，這裏不能具引。但是，對這樣一種歸納方法，當時的意見似乎并不一致。同樣作為敦煌變文集編者之一的向達在他所作的敦煌變文集引言中說：「像這一類的作品，固然有些是題上變文的名稱的，是否就可以一律稱為變文呢？」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唐代寺院中所盛行的說唱體作品，乃是俗講的話本。變文云云，只是話本的一種名稱而已。」其實，早在三、四十年代，向氏便已表示了類似的見解。向氏在他的著名論文唐代俗講考中說：

說者亦有謂俗講話本應一律稱為變文者，試加覆按，可以知其不然。目連變、降魔變、王陵變、舜子至孝變等多以變文名，固矣。然季布罵陣詞文固明明以詞文或傳文標題。而所謂押座文、緣起，以及敷衍全經諸篇，非自有名目，即體裁與變文迥殊。今統以變文名之，以偏概全，其不合理可知也。

受向氏此說的影響，一九六三年，周紹良先生發表談唐代民間文學的論文，把敦煌說唱類作品分為變文、俗講文、詞文、詩話、話本、賦之類（周先生後來在唐代變文及其他^{二六}一文中，對這個分類有所修正，即改「俗講文」為「講經文」，又增設「因緣」一類）。同年發表的程毅中先生的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也力主「變文」和「講經文」并非相同的文

體。最近幾年，這一種說法似乎越來越占了上風。白化文的什么是變文（二七）、張鴻勳的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類型初探、高國藩的論敦煌民間變文（二八）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作。但在我們看來，既然大家承認「變文」本是「變相」之文，那末王重民認為「講經文是變文中最初的形式，它的產生時期在變文中為最早」的論斷便不是沒有根據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有云：「（顯慶元年十二月五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等，奏曰：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有的學者認為其中的「報恩經變」應是指佛報恩講經文而言（敦煌寫本有「雙恩記」一種，即是演繹佛報恩經的講經文）（二九），如果這一推斷可信，那就更可證成王說。另外從原題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原卷尾題，首題作前漢劉家太子傳）的變文來看，可見變文的體裁可以是韻散結合，也可以是通篇韻文或通篇散文。至於「因緣」，與「變文」異名同實，這更已在變文寫卷本身得到足夠的證明（三〇）。那種僅據寫卷題名的差異或體裁的不一便斷言講經文、因緣、詞文、話等等不屬於變文的說法，恐怕有失切當。臺灣著名學者潘重規先生指出：

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它的實質便是故事，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等不過是它的外衣。……變文所以有種種的異稱，正因為它說故事時用種種不同文體的外衣來表達的緣故（三一）。

這是潘氏經過深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值得重視的。

變文的名義、淵源、類別具如上述。那末變文的發現及其研究有些什麼意義呢？對此鄭振鐸先生有一段話說得極好，且把它抄在這裏：

在敦煌所發現的許多重要的中國文書裏，最重要的要算是「變文」了。在「變文」沒有發現以前，我們簡直不知道：「平話」怎麼會突然在宋代產生出來？「諸宮調」的來歷是怎樣的？盛行於明、清二代的寶卷、彈詞及鼓詞，到底是近代的產物呢？還是「古已有之」的？許多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都成為疑案而難於有確定的回答。但自從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寶庫打開了而發現了變文的一種文體之後，一切的疑問，我們纔漸漸的可以得到解決了。我們纔在古代文學與近代文學之間得到了一個連鎖。我們纔知道宋元話本和六朝小說及唐代傳奇之間並沒有什麼因果關係。我們纔明白許多千餘年來支配着民間思想的寶卷、鼓詞、彈詞一類的讀物，其來歷原是這樣的。這個發現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面目為之一新。這關係是異常的重大。……「變文」的發現，却不僅是發現了許多偉大的名著，同時，也替近代文學史解決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便是近十餘年來，我們為什

麼那樣的重視「變文」的發現的原因⁽¹¹¹⁾。

鄭振鐸先生的這段話，主要是從文學的角度着眼的。如果從語言方面來說，變文採用的是接近當時口語的文字，保存着大量的口語資料，它對於推究古今語音演變之軌迹，考索宋元白話之沿溯，都有着重大的參考價值。呂叔湘先生把以敦煌變文為代表的敦煌俗文學作品看作是近代漢語跟古代漢語的分界綫⁽¹¹²⁾，也說明了敦煌變文的巨大價值，無論在文學還是在語言上都不容低估。

正是因為敦煌變文具有如此巨大而且多方面的價值，所以從它被發現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不但研究論文日見其多，有關的輯本、校本、注本也不斷問之於世。繼羅振玉刊布「佛曲三種」，稍後劉復輯敦煌掇瑣⁽¹¹³⁾、向達輯敦煌叢鈔⁽¹¹⁴⁾、許國霖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¹¹⁵⁾，也都收錄了一定數量的敦煌變文作品。此外一些書刊雜誌上也陸續校錄刊布了若干篇變文作品。這些工作雖是零星的、不完整的，但却為日後編輯比較完備的敦煌變文的校錄本準備了條件。一九五四年，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彙錄，收錄變文作品三十八篇，這是我國第一部規模較大的敦煌變文專集。一九五七年，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等六位先生合編了敦煌變文集，該書根據國內外公私收藏的一百八十七個寫本，詳加校勘，整理出變文作品七十八篇，堪稱是自有敦煌學以來變文輯本中最豐富的一部。最近幾年，人們從敦煌遺書（主要是俄羅斯所藏者）中又整理出雙恩記、維摩詰經講經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十吉祥、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孟蘭盆經講經文等變文作品多種。一九八四年，臺灣學者潘重規先生推出了新一代的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¹¹⁶⁾，該書以敦煌變文集為基礎，校正了原書的一些錄文錯誤，所收作品數量也有所增加。這些變文輯本的出版，給變文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推動了變文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但由於敦煌變文來自民間的土壤，採取的是接近當時口語的文字，其中有着大量的「字面普通而義別」的方俗語詞；同時由於變文基本是以寫本的形式保存下來的，不但充塞着大量的俗體別字，訛、舛、衍、脫的情況也隨處可見，而且還有着許多殊異於今日的書寫特點。這種繁複的情況，就給變文的校讀帶來了特殊的困難。所以儘管上述輯本的編校者都是海內外久負盛名的敦煌學專家，但在校勘方面却存在着不少的問題。以敦煌變文集而言，該書自一九五七年問世以後，有關的商榷、補校論文（論著）竟已達一百四十餘篇（種），疏漏之多，可以見其一斑。有鑒於此，近年來國內外的一些著名學者都一再呼籲學

術界編輯一個敦煌變文的新校本。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在評論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時曾經指出：

變文的抄寫者多數水平不高，字形訛誤很多。本書的考訂完全根據敦煌變文集的印本，如能核對顯微膠卷，可能效果更好。說實在的，敦煌變文集的校訂工作是很不夠的，需要吸收這些年來的校勘成果出版一個新的本子。⁽¹¹⁷⁰⁾

後來呂叔湘先生在談到「近代漢語」的研究時，又一次指出：

敦煌俗文學作品是研究晚唐五代詞匯和語法的重要資料，一部經過精細校勘的敦煌俗文學作品集實在是非常需要的。⁽¹¹⁹⁰⁾

此外，任半塘、徐震堃、項楚、王鐸等著名學者也都曾在不同場合呼籲過敦煌變文新校本的編輯和出版。

正是在呂叔湘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感召下，一九八五年前後，我們開始醞釀敦煌變文新校本的編撰工作。一九八七年初，先師郭在貽教授和我們一起製訂了「敦煌學三書」的科研計劃。「三書」的第一種是敦煌變文集校議，第二種是敦煌變文校注（當初擬名為敦煌變文匯校），另一種是敦煌吐魯番俗字典。一九八九年一月，正當「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大體完成，並將轉入校注的撰寫之際，萬惡的癌細胞竟突然奪去了郭師年輕的生命！郭師在留給我們的遺書中說：

涌泉、黃征：

匆匆地告別了，萬分惆悵。你們要努力完成我們的科研計劃，爭取把三本書出齊，以慰我在天之靈。

失去了敬愛的導師，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悲痛。在我們困難的時刻，項楚、沈錫麟、柴劍虹等先生給了我們許多的鼓勵和支持，堅定了我們完成郭師未竟之業的信心和勇氣。現在幾經寒暑，總算大功告成，完成了敦煌變文校注這百餘萬字的大工程。先師天上有知，也會感到欣慰的吧。

關於本書的體例，具見凡例，茲不詳述。這裏只是有幾件事想特別交代一下：

一、關於俗字的處理。如前所說，變文是以寫本的形式流傳下來的俗文學，其中俗字之多，實為它書所罕見。如何辨識和處理這些俗字，是變文校勘、出版中的一大難題。敦煌變文集的校勘原則是「絕不改動原文」，俗寫別字「盡量

保持原來的字形」。但事實上，這樣做是極其困難的。這不但是因為敦煌寫本中俗字的使用實在是太普遍了，可以說是錄不勝錄；而且即使錄下來，要把它們刻成鉛字也是近乎不可能的。敦煌變文集摹錄了一部分俗字，却忽略了另一部分俗字。以廬山遠公話為例，變文集沒有摹錄的字如「覓(覓)」、「趁(趁)」、「腦(腦)」、「叫(叫)」等等，無慮數百千個。這種為例不純的情況，頗易使人發生誤會。考慮到上述情況，同時考慮到本書的主要目的是為研究和閱讀變文的人們提供一個普及讀本，所以我們把那些經過研究可以確定無疑的俗字徑改為通行的繁體字。作為本書的姊妹篇，目前我們正在編撰敦煌吐魯番俗字典，研治文字學的人們或者對俗文字有興趣的人們是盡可以加以利用的。

二、關於敦煌變文集新書。潘重規先生的敦煌變文集新書是一九八四年由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印行的。但由於海天之隔，大陸學人欲睹無由（浙江省各大圖書館至今未購置此書）。一九八八年四月底，北京圖書館為我們提供了潘書的複印件，我們纔得以拜讀。其時我們撰寫敦煌變文集校議的工作已完成大半，一批補校論文已在（或將在）一些大中型刊物上登載，這些論文中的一些說法或與潘書暗合，然亦頗可互相補充印證，所以後來寫入校注時一仍其舊，同時標列潘校（潘書僅出校原卷某作某者不一一標列），以示不敢掠美。

三、本書的分工情況如下：卷一至卷四（除十吉祥）凡三十七篇由黃征負責校注；卷五至卷七凡四十九篇由張涌泉負責校注。初稿完成後交換校閱一過，最後由執筆人寫定。全書署名按音序排列。

四、本書是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項目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及高校古委會資助項目，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也對本書的撰寫和出版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呂叔湘、季羨林、蔣禮鴻、傅璇琮、裘錫圭、曹先擢、王鐸、蔣紹愚等先生也十分關心本書的撰寫和出版工作；敦煌變文集原編者王慶菽、周一良先生對我們的研究給予了指教和鼓勵；劉堅、樊維綱先生審讀了部分樣稿，在此我們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先生在他九十壽誕之際為本書題寫書名，姜亮夫先生為本書作序，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這裏我們還要特別感謝項楚、沈錫麟、梅季坤、李解民、劉宗漢、駢宇騫、柴劍虹、陳抗等先生和責任編輯李亞明同志，沒有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本書是很難完成也很難出版的。

最後我們特借用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引言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中國學術典籍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結晶，它是具有永恆不朽的生命的，我們都只是為它服務的工作人

員，但我們都對它有崇高親切的敬愛。我們希望一個接一個的貢獻心力為它做出有價值的工作。

著者 一九九〇年元旦初稿

一九九一年五月重稿

注釋：

- 〔一〕 載小說月報二十卷十號，一九二九年。
- 〔二〕 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出版。
- 〔三〕 載新思潮一卷二期，一九四六年。
- 〔四〕 載上海大晚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
- 〔五〕 載天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
- 〔六〕 載現代佛學一卷十期。
- 〔七〕 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二輯。
- 〔八〕 載新建設一九五七年三期。
- 〔九〕 載文學遺產增刊十輯，一九六二年。
- 〔一〇〕 載新建設一九六三年一期。
- 〔一一〕 見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同〔五〕。
- 〔一二〕 馮宇有漫談「變文」的名稱、形式、淵源及影響一文，載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六〇年一期；張鴻勳有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類型初探一文，載文學遺產一九八二年二期。
- 〔一三〕 載覺群周刊一卷一期至九期、十一期，一九四六年。
- 〔一四〕 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版。
- 〔一五〕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二六〕 載文史知識一九八五年十二期、一九八六年一期。

〔二七〕 載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一九八〇年。

〔二八〕 載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二九〕 參看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附載於敦煌變文集新書之末。

〔三〇〕 伯三〇四八金剛醜女因緣，結尾稱「醜變」，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篇題「因緣」「變」並用，文中簡題作「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又稱「緣」，伯二一九三日連緣起，體裁與稱作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寫卷相仿。凡此均足以證明「緣」、「緣起」、「因緣」與「變文」異名同實，是一回事。

〔三一〕 見敦煌變文集新書後記。

〔三二〕 中國俗文學史上冊一八〇至一八一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八年版。

〔三三〕 見劉堅近代漢語讀本序。

〔三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一九二五年。

〔三五〕 載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一九三二年）、六卷二號六號（一九三二年）。

〔三六〕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鉛印本。

〔三七〕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一九八四年印行。

〔三八〕 見新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讀後，載中國語文一九八二年三期。

〔三九〕 同〔三三〕。

〔四〇〕 岳麓書社一九九〇年版。

凡例

本書的校注體例，依用敦煌變文集的成規，而略作變更，茲述之如次：

一、本書所收變文，包括敦煌變文集之大部，并增輯俄羅斯、臺灣、日本等地所藏變文寫本，凡八十六種（敦煌變文集原錄七十八種，其中下女夫詞、秋吟、搜神記、孝子傳四種并非變文，茲予剔除；另外伯二二二維摩詰經講經文一種，實為維摩經押座文的一部分，茲予以合併。而斯二四四〇解座文一種，變文集錄於三身押座文之末，經研究實屬「解座文」，故獨立為篇。新增者十二種）。

二、本書編次，與敦煌變文集相同，包括歷史故事和佛教故事兩大類。歷史故事依文體之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和對話體，分為三卷，每卷更依歷史時代次序之。佛教故事則依佛（釋迦）的故事、佛經講經文和佛家故事，亦分三卷。押座文及其他短文則置於其後，總為一卷。

三、本書錄文以敦煌變文集及相關輯錄本為基礎，而核之以敦煌寫本原卷（多據縮微膠卷）。寫卷情況及迻錄底本、參校本在每篇校注第一條中說明之。文題由編者擬定者以【】括之，亦在校記第一條說明之。錄文力求忠實於底本原貌，凡據他本校補或少數以意改正之處，均在校語中說明之。凡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一般不出校；一般的異文不出校；底本誤而他本正確者，徑改正文，在校語中說明所據；底本文字比較費解（如俗語詞、較難辨識的俗字等），出列異文；兩本所記有出入的，出校錄異。底本缺字用□表之，不能確定所缺字數者用□表之；缺字據別本或上下文補足時，所補之字以「」括之；如底本原是脫誤，則先作「」，然後旁注補字於（）內。

四、一般的俗字徑改為通行的繁體字，不出校；敦煌變文集照錄存疑或易於誤認的俗字，除改為通行繁體外，出校加以考辨。形近誤字一般徑改為正確字，出校說明理由。音近誤字及假借字照原字迻錄，在校記中注明本字；一些較流行或易於認識的假借字如「猶」與「由」、「教」與「交」、「已」與「以」之類在（）中注明本字，不出校記（至於「慧」與「惠」之類，音同義通，概不出校）。凡是古今用法不同的字，如「元」與「原」、「弟」與「第」、「孃」與「娘」、「奉」與「捧」、「閱」與「憫」、「坐」與「座」、「隱」與「穩」、「陪」與「賠」之類，一

般據底卷逐錄，以存古書之真。

五、本書保留敦煌變文集的所有校記。敦煌變文集的錄文稱「原錄」，校記稱「原校」。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簡稱為「潘書」，校記稱「潘校」。徐震堦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及再補簡稱為「徐校」。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簡稱為「通釋」。稱引其他各家校說則均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同志字樣。凡數家說法相同者，一般只標舉刊佈時間較早一家的說法，其餘從略。稱引各家校說截止期為一九八九年底，書末附列有關論著的目錄，文中不一一注明。

六、方俗用字用詞，為舊時字典辭書所不屑道。而敦煌變文源自民間，記以口語，書以俗字，誠為方俗字詞之淵藪。此類字詞，索解匪易；而字典辭書，又多告闕如，每令讀者望字（詞）興嘆。故本書對那些字面生澀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別的俗語詞酌加箋釋，以便讀者。其他普通字詞及人名典故之類，則一般不予注釋，以免繁重。

七、書末附列本書所引變文補校論著目錄、敦煌變文語詞索引等。

目錄

序	姜亮夫	一
前言		一
凡例		一
卷一			
伍子胥變文		一
孟姜女變文		六〇
漢將王陵變		六六
捉季布傳文		九一
李陵變文		一二八
王昭君變文		一五六
董永變文		一七四
張議潮變文		一八〇
張淮深變文		一九一
卷二			
舜子變		二〇〇
韓朋賦		二一二